



银冈书院：致知格物，启迪后贤

□ 王恩宝

在东枕柴河（辽河一级支流）犹如巨龙之首钟灵毓秀的铁岭龙首山下，有一处古朴幽静的清代园林式建筑群——银冈书院。银冈书院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系清湖广道御史郝浴（号复阳、中山）谪居铁岭时自建的居室和讲学授徒之所。康熙十四年（1675年）郝浴复官回朝，将此居所捐出成立银冈书院，成为辽北“昌明理学，启迪后贤”的庠序之地。康熙年间曾任顺天府尹、奉天府尹的屠沂，把银冈书院与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并列为全国五大书院。

银冈书院已有360多年历史，是东北地区建院最早、办学最久、影响力最大的清代书院，是东北地区现有保存最好的书院，是清初东北地区流人聚会的场所，也是周恩来离开家乡来东北后的启蒙学校和一些革命志士的启蒙学校。

“致知格物” 尽显鲜明特色的办学方式

作为清代的一个教育场所，在遵从统一教规基础上，银冈书院以“致知格物”为教育宗旨。“致知格物”原是书院创始人郝浴自身的修养准则和信条。创办银冈书院后，郝浴将自己原来的书室命名为“致知格物之堂”，并亲笔题书与堂前。“致知格物”是郝浴为银冈书院确立的教育宗旨，富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郝浴复官回朝把银冈书院无偿捐给辽北官府作为办学之用后，在此执教的董国祥曾对“致知格物”做以进一步阐释：“知者，心之灵也。致者，推而极之以求蔽也……天下、国家、身、心、意皆物也，诚正修齐以至治平即格物也……此即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由此可见，银冈书院确定的“致知格物”教育思想，其本意是以育人为本，重在教育修身，而不是专为科举和仕进，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讲学是古代书院的主要特色。银冈



书院的讲学非常活跃，从银冈书院的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书院讲学的映像。光绪四年（1878年），“聘新民举人李百川主讲，而宁远举人李崇瑞继之。自此主讲者岁无虚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乃聘赵（维城）为书院主讲。赵古文得阳湖派，而尤深理学。士子耳目一新，书院成绩为最至”。

银冈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将书目刻成碑文，以示永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银冈书院捐添经费建修斋房后，曾刻“银冈书院资产记”“银冈书院捐添经费建修斋房记”二碑，碑阴为“书院所添书籍”。前碑列有旧存《中山全集》《古今图书集成》等书2280余本，后碑列有新添《史记》《盛京通志》等书1890余本，新旧图书共4100多函册。这是我国罕有的古代石刻图书目录，被载入国家图书馆馆史，实为稀世珍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化价值。

“自强不息” 促进流人文化唱和与交流

银冈书院本是郝浴谪居铁岭时所建，书院内郝公祠廊柱上的对联“勤奸不敢欺君父；卧雪犹然志圣贤”展现了自强不息的流人文化特色。流人，流放之人，是清朝《大清律》中答、杖、徒、流、死等5种刑罚之一。中原大地出山海关外，东北寒带地区，荒凉偏僻、人烟稀少，遂被辟为流徙要地。

铁岭是东北流放的重点地区。流放人员经常互相探访，郝浴在东北流人中具有广泛影响，银冈书院成为东北流人一个集会之地。流人中一些著名学者、诗人，如吴兆骞、陈之遴、陈掖臣、左懋泰、戴遵先等与郝浴皆有往来。

流人文化在东北文化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银冈书院是承载东北流人文化的一处纪念地。流人及其后辈后学不甘沉沦、意志坚贞，不断将文化种子播撒到东北大地上。大批流人在东北地区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矿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流人文通墨，类以教书自给”，在教学授徒、传播文化、发展艺术、推广医药学及哲学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博得了时人与后人的赞颂。现今在《铁岭县志》《奉天通志》《中山郝中丞全集》等史料中依然可见当年郝浴与东北流人之间的唱和与交流，这种唱和与交流，体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怀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对铁岭文化、辽北文化乃至辽宁文化、东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启迪后贤” 革命思想启蒙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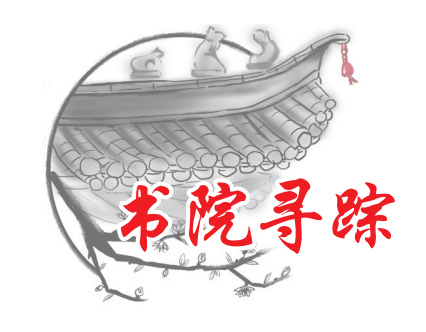
1903年，由银冈书院总董曾宪文等人创办的辽北地区第一所新式学堂——

银冈学堂在书院内成立。学堂实行西式教育，传播西方先进思想、科学技术知识乃至近代革命思想。进入近现代以来，“启迪后贤”的功效在银冈书院越来越突出。以进步思想影响、教育莘莘学子，是银冈书院最突出的文化特色。银冈书院后来成为辽北乃至辽宁、东北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1910年春，周恩来随同三堂伯周贻谦从家乡淮安来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入银冈书院读书。在这里，周恩来第一次接受西方教育启蒙和革命思想熏陶，学会了《满江红》《何日醒》等爱国歌曲。周恩来在银冈书院所受到的爱国主义熏陶尤为强烈，这也是他能在少年时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动力源。

被列宁誉为“勇敢的战士、出色的指挥员、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苏联红军中国团团长任辅臣，曾在银冈书院学习3年，1918年在苏俄卫国战争中壮烈牺牲。中共党员石璞，曾启蒙于银冈书院，1930年英勇牺牲，是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中最年轻的烈士。中共党员陈剑飞，少年时期曾在银冈书院读书，入党后被派到东北军中工作，曾在西安事变中做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

如此等等，银冈书院可称为周恩来等革命先辈的思想启蒙学校，他们从这里开始走向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红色革命之旅。进入新时代，承载着书院文化、革命文化的银冈书院的爱国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基地作用更加凸显，意义更加深远。



□ 凌龙华

老子的《道德经》，不过5000余字。意义与影响，非同寻常。《诸子概论》中对道家之流派分为如下四类：有为派、无为而无不派、无为派、无为派，足见“道”无处不在。

道是什么

“道”是什么？为什么“道”为根本？《道德经》的第一章，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妙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语点破“道”的本质——“道”不是具体的事物，也不是事理的简单对应，而是高度概括、高度抽象的“道理”，即支配万物、统领万事的客观规律，现代表述当为宇宙法则。

道理是“玄”的，具象为“无”；但道理又是客观的，来自于实践，体现为具体的“有”，因而也是不玄的。对立统一，九九归一，再读下面的文字，就会有所启迪：“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为万物之源、万事之理，自然存在，作用自然。初为“无”（无中生有），进而为“大”，为“一”，复归于“无极”。哲学意义，这是本体论，指向宏大的宇宙观、世界观。因而知“道”不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道”先于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道”有法则。其一为顺生法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二为转化法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一阴一阳，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反动的正面是推动。“反者，道之功；弱者，道之用。”守雌为雄，柔能克刚。站在阴柔消极一面看世界，则世界冷静无所谓；站在积极阳刚一面看世

界，则世界热烈有所为。

不是“不为”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老子的“无为”其实是“形而上”层面的“有为”，即“道”指引下的“经世致用”。如果说孔子是以积极姿态锲而不舍地“为”，那么老子就是以超脱姿态自然而然“无为而为”——觉悟之下的自律。

第一，所谓“无为”，其实是有底气、具“上德”，自然教化，“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在儒家，便是“修身”，行之天下则为“德治”。

第二，不是不为，而是不为“为”而为。也就是说，绝不把手段当目的，舍本而求末。为“为”而为，势必千方百计、争名夺利，推向极端必“伪”——“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儒家主张推己及人，这里老子也是推己及人，不过他是从“性本恶”加以推定。“上德”的底线为“下德”。“下德”矜持，太在乎，为了名分，往往弄巧成拙，因而老子讽之“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是老子冷眼看人生，但他老人家终究食人间烟火，心肠还是热的，于是在嘲讽之后马上补上一句勉励“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意思是说，没“上德”没关系，那就努力固守吧，通过“有以为”而不失职、不失德。

水以善下而臻于道，江海“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由自然界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移用到人生，便是“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老子苦口婆心的无为说，说到底还是超脱的“有为”。中庸的表达，可能就是“为而不争”，进一步推演则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天行有常，世上本无多事。对统治者而言，“无为”乃是不扰民，不与民争利，更不是逼迫百姓。如果自以为高明，四面出击，朝令夕改，结果就会适得其反，“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

为，是以难治”。因此老子劝导，“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为无为，则无不治”。

“无为”前提是“有为”

无为的前提乃有为，表现在国家治理上，当然是德治与礼治，这与儒家观念如出一辙：“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关键是“法治”。一是“依法”，这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按自然界的大法则自觉行事。二是“得法”，这是路径，也是方略，告诫世人自律而自力，由“知道”而“行道”。

“道不远人”“道法自然”。规律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要懂得并遵循自然之道，这中间亦包括得天下与治天下：“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大德”。

无论人生还是社会，正能量进取始终是主旋律。下面的引用，你能判别是“儒家言”还是“道家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其实都是老子言，何尝不是孔子或荀子语？正话反说，急话缓说，回到原点，道儒一体，儒道相济。“为”是常态，“无为”是境界，“无不为”则是理想状态。《老子》最后一章的结语，一语中的，可为“无为而无不为”作交代：“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大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大学治理提出的目标要求，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障。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转变，为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强烈需求，一些大学选择了规模扩张的发展道路，但如果盲目追求“大而全”，很容易目标定位多样，各种矛盾凸显。为此，提升大学治理能力，解决影响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才能为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产出创新性科研成果、更好服务社会发展等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才能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需要。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要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一流大学建设指明了方向，更对大学内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不仅需要通过改善政策环境来增加教育投入、提升办学条件，更需要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一流治理。如果说前者是一种依靠外力的要素驱动，后者则是一种通过组织治理创新、激发内部活力的效率驱动。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双一流”建设中缺一不可。

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科技在社会各领域日益广泛应用，教育领域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系统位于科技前沿，其价值理念、发展形态、供给方式和教学模式等各方面各环节各要素正发生根本性、革命性变革。聚焦到大学治理，现代信息科技既为大学治理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为推进大学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对大学治理的有效实施、信息公开、成本控制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应对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至关重要。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规制大学的外部治理

中国大学在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大学在领导体制机制方面的制度优势和鲜明特色。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根植中国土壤、中国文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同时结合实际的治理成果和成功经验，探索现代大学治理的“中国之治”。

同时，良好的大学治理离不开社会监督，社会参与是大学治理的重要维度。社会机制作用于大学治理的形式表现为需求、参与和监督，相应的，现代大学需要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承担社会责任，接受社会监督。在大学治理中，既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和参与，增强大学治理的公开性和公益性，同时也要保持大学的理性追求与内在发展逻辑。大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但要规避市场规则的缺陷和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为社会提供“真正学术性的、科学的、适度的服务”。大学需要与社会保持良好的关系，既走近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又要与社会保持

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晏维龙

适度的距离，遵循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消解市场化、工具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

完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进大学的内部治理

大学治理效率不同于行政系统的效率，大学治理效率的评价标准是大学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贡献度。提高大学治理效率需要思考大学如何在党委领导、行政系统支持下，充分激活大学学术系统的活力和能量。大学治理现代化应以提高治理效率为理念，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科学研究规律，谋求大学治理模式系统性转型。

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高效的执行机制、完善的监督机制是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性保障。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师生参与的作用，并加强前期预研、中期跟踪、后期评估，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在决策执行中，需要通过激活主体参与、创新激励考核制度、建立督查制度等方式，全面提升重大决策的执行力。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也不可或缺，大学需要通过规范权责边界，加强程序规则建设，畅通信息公开渠道，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全面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水平。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党委书记）

